

□长庚

殷墟博物馆新馆文物:图左为“亚长”牛尊,2000年河南安阳殷墟出土;图中为司母辛鼎,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;图右为小屯南地2172号甲骨,1973年在河南安阳小屯南地甲骨窖穴发现。



由《万古江河》而发

许倬云在大学求学期间,受教于中国第一代“海归”,如李济、沈刚伯、李宗侗及其他文献史学、考古学界的硕学大儒,奠定了他扎实的学术基础。此后,许倬云兼跨中西学术圈,学术取向上致力于打通今古,所以对考古发现与研究极为重视,与同辈的张忠培教授等相交甚笃,切磋合作,得以遍访大陆重要遗址和发掘现场,共同组织学术活动。而张忠培又是中国第一代考古大家苏秉琦的受业弟子。在许倬云的研究背后,我们可以窥见海峡两岸数代学人由分到合,共同探求华夏文明起源及其演变过程,殊途而同归的学史轨迹。

此前,许倬云的《万古江河》曾引起热议。长江、黄河这两条中国的生命之流,各自发展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。中国文化的整体,当然也应当包括长江、黄河流域以外的地区。许倬云从江河讲起,分析了各个地区不同的地方性文化如何交缠为一,终于建构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文化格局。在他的笔下,这一文化格局不是部落性的,也并非民族性的,而是国家性的、普世性的,可以称之为“天下格局”。“天下格局”这个词,并没有“帝国主义”的含义,只是说明中国文化的内涵,乃是以“天下”为关怀,不受国界的限制,以万民百姓为同胞,也就是《论语》所说“安人”“安百姓”。“百姓”指的是许多不同族群,并非任何一族。

除了中国文化,世界几个主要的文化体系,几乎都从犹太教的根源衍生而成,都是拥出独一无二的神,这个神对某一族类或其信仰者,有“偏爱的佑护”。这一套独神教的信仰,基本上是排他的。中国文化在形成过程之中,到了周代,以抽象的“天”作为宇宙的全,天人相对相成、互相证明。因此,中国文化是大宇宙来定义人间,再以人间孕育下面各个层次的空间:国、族、亲戚、乡里、朋友。这一级一级由个人而至天下的网络结构,每一级之间,都是彼此关联、前后相续的,中间不能切断,更非对立。

这些观点被许倬云写入了《万古江河》,从而厘清中国文化本身发展的脉络,及其从若干地区性的文化逐渐融合为一个近乎世界性大国的历程。《万古江河》写完后,许倬云常常感觉,自己所讨论的其实大多是中国文化圈内部的演变。既然这一文化圈的特点是宇宙涵盖其上、世界承载于下,那么居于二者之中的我们,究竟该如何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呢?于是他萌生了撰写新作的想法。

“经纬华夏”之名,是许倬云从许多考古遗址的分布,以及系列古代文化的延伸与转折中得出的。许倬云认为,在漫长演化之中,中国文化有许多个体的遗址可以排布为序列。《经纬华夏》的论述逻辑是,将中国历史归纳为时间之序列、空间之扩散,从而理解人类的移动轨迹,以及族群之间、国别之间互动的形态。这就是将遍地开花的遗址,组织成有演变、有调节的整体叙事:将大面积、长时段,以其特征为代表的大文化群放在一个区内,也就等于以大型结构体的组合,叙述历史上长时段推演的故事。

在世界大局中 读懂华夏经纬

“我要从世界看中国,再从中国看世界。”围绕这一发端,历史学家许倬云以九旬高龄,八易其稿,撰写出一部华夏文明从成长到成型的传记——《经纬华夏》。在超越五千年的叙述中,许倬云借由对中国地方性文化如何交缠为一,以及中国如何应对来自世界之冲击的细致分析,揭示了华夏文明能够延续至今,并将绵延永在的核心与奥秘,预见了一个有根底、有方向的中国。从前现代走来的他,身处现代文明的漩涡,窥见了许多后现代的问题。

三个核心区很稳定

在《经纬华夏》前面数章,许倬云尝试将古代中国的演变,组织为三个核心区。每个核心区都有其发展的过程,也都有其内在的特色。而三个核心区之间的互动——或延伸、或演进、或转接、或扩散,正是华夏文明本身从成长到成型的“诗歌”。

第一区在黄河流域,从关陇直到渤海,北面是“塬上”这一游牧民族的家乡,南面则是“秦岭—汉水—淮河水”以外广大的长江湖泊地区。这个核心区域,一向被视为中国古代文明的“中原”。

第二区在西北的源头是川北的岷江流域,南边的界限则一直到南岭,其最东端是长江口和大湖,“吴头楚尾”,在此与中国沿海的第三区相接。整个第二区气候温暖、水分充足,地理景观与生活条件确实比第一区更为优越。这一区习惯上被视为南方,作为第一区的延伸。在历史上的中国,第一区受北方游牧民族重大冲击时,其主体会撤退到第二区。

第三区在长江口以南,以南

岭、武夷山为界的东南沿海。海岱地区文化的扩散,带来了优良的文化传统,刺激了各处新迁地区文明的发展。他认为,龙山—大汶口文化从海岱地区的扩散,将各地新石器时代终结,开启了青铜文化的转机。

这三个核心区,遍布着山陵丘壑与河流湖泊,处处相叠相交,构成中华文明主流舞台。当然,三区的边缘地带,还有另外两片广大区域:一是中国西北部,崇山峻岭与沙漠、绿洲交错,喜马拉雅山、天山与阴山是中国许多河流的发源地;二是中国西南部,山高谷深,民族成分复杂。这二者,被许倬云认为是中华文明逐渐延伸而扩张的腹地。

从历史发展看,如果北方农村聚落所构成的防卫系统,无法抵抗游牧民族的冲击,则华夏集合体的“神经中枢”可以立刻由第一区迁入第二区。例如,永嘉南迁后防守的前哨站,就放在荆、襄、江、湖和江北淮泗。如果来自北方的压力更进一步,还可以撤退到第二区所谓“吴头楚尾”处。例如,靖康之乱后南宋迁都杭州,而仍旧以巴蜀、关陇作为前哨,以荆、

襄、江、湖作为后盾,政权延续了一百多年。20世纪日本侵华,南京国民政府从沿海撤入巴蜀,以三峡下游的长江作为第一道防线,又在西南的群山之中开出后路,通向外面的世界。

由此,许倬云找到了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特色:在全世界人类文化发展的地区中,中国是最为完整的一片土地。在此疆域之内,不同族群频繁进出,交会时不断摩擦与融合。于是,中国文化经历多次调整与磨合之后,呈现其鲜明的包容特色,而这一特色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“调和”。

整个中国的局面,自东往西、从南到北,区与区之间相互依仗、彼此掩护,是一个内部完足的整体,从而具有巨大的稳定性。如此特色,在世界其他文化形成过程中,甚为罕见。

自省是前进的动力

如此看来,中国文化的大格局,几乎是“金刚不坏之身”。可是,我们不能不提出一个疑问:为何在宋以后,尤其明清阶段,中国

对外面的感应显得迟钝和保守,最终在清末面对西潮的轮番冲击时手足失措呢?

许倬云的解释是,正因为这个完整的格局稳定性太高,当外来者释放挑战的信号时,其下意识反应可能就是:“我不想要”“别惹我”。在他看来,中国在过去建构出庞大的文化体,可能做到了非常彻底的程度,导致这个严密的文化体,终于趋向严重的“内卷”。最显著的现象是郑和七次下西洋,居然没有带回任何新的观念和事物。主要原因可能在于,当时的中国往外面看,发现没有值得学习之处。这一自满,终于造成了对外严拒固守的心态。

而后续的发展,似乎又有些矫枉过正。18世纪,中国遭逢来自西方文明的挑战,在交锋中一败涂地。如此不利的状态下,中国不得不学习西方:先是学西方的军械,后来学西方的商业和工业技能,最后才不得不输入西方的思想与文化价值。由于学习西方的动力是失败之后不得已而为之,心理状态难以平衡,也就难以遵循正常的心态学习:严拒、不甘、饥不择食、囫圇吞枣,以致于五体投地,崇拜而不省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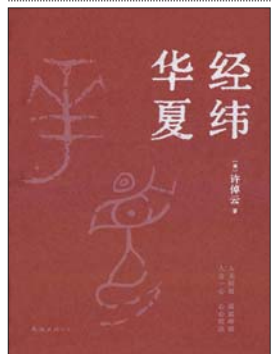
许倬云直言,近两百年来,中国人学习西方事物,几乎从来不先从根本上入手,从事起码的研究。“国人似乎眼光只在学会西方长处,只是舍己从人,而忘了审视中西心态其实相当不同,未曾想到从中西不同之处自省其差异。过去如此,近来又何尝不是?”

“若能再从他人之长处接合设计,当能另辟蹊径,开拓新天地。”许倬云呼吁,要从世界看中国,再从中国看世界。“没有这一番内外翻覆的呕心吐血,我们将无法顺利面对欧洲领导的近现代文明。没有这一番自省,我们将无法采人之长,舍人之短,在我们源远流长的基础上,发展一个对于未来全人类有益处的选择。全人类只有在东与西的冲突与疏离之后,熔铸一个未来真正的全球化文化的初阶,才可以在更远的未来继长增高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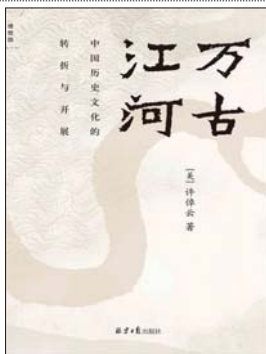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必妄自菲薄”的底气,来自于对中西文化的理性认知。许倬云认为,中国固有的文化性格,有相当重要的动态成分,例如《易经》的“变”,是一个永远变化不断的特色;而西方文化之中,却有独神信仰专断的一面,也因此以为世上只有一种格局得神佑可以长存。“进行修改自身的重要任务时,我们要时常自省:任何改变,不应当囫圇吞枣,而应当注意到,将他者的‘变’与自身的‘变’,合成一个陀螺旋转式的动态平衡。人类的历史,本来就是不断适应、不断变化的恒动过程。”

一种文化,没有美好的愿景,最终会僵化而停滞。在许倬云看来,中国文化可以为全人类做出更大贡献。他提出,中国文化中的“大同世界”,是个人为全体,全体也为个人。在个人到群体的每个阶段,都有相对应的责任,也有相对应的义务。而群体的存在,则是提供个人无法独立完成的工作,有群策群力的动力,可以共同走向成功。如果以《礼运·大同篇》来表述,每个人的抱负,应当是“修己以安人”。“安人”的过程,从近到远,逐步扩大,最后达到“安百姓”,也就是安顿所有的人类。在这“大同世界”没有实现以前的“小康世界”,至少要做到人人有工作,使得人尽其才、物尽其用、货畅其流。

【相关阅读】



《经纬华夏》
许倬云 著
新经典文化 | 南海出版公司



《万古江河》:
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
许倬云 著
理想国 | 北京日报出版社



《说中国》:
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
许倬云 著
理想国 |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